

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开始：

八一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是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同时也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开始。

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极为重要的大事，自然成为中外多款纪念邮票的素材。如右上的这张邮票，即由古巴发行，其上的图案就是那幅广为流传的表现南昌起义场景的油画作品。

1927年，从南京国民政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7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清党”，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中，革命处于随时被扼杀的险恶境地。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下旬决定在南昌实施暴动，同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由李立三、恽代英和彭湃等组成的前敌委员会，领导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导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城举行起义。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并完全占领了南昌城，八一南昌起义取得阶段性胜利。

八一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它如一声春雷，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伟大的革命实践必然孕育出伟大的革命精神，听党指挥就是南昌起义革命精神的核心内涵。南昌起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起义准备阶段，前敌委员会牢牢把握部队的政治方向，成为部队的坚强领导核心。起义成功后，周恩来庄严宣告：“现在，我们起义成功了。从此，这里的军队归共产党领导。”在实质上明确了党领导军队的原则。起义后的部队整编，绝大多数的军、师、团都配备了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指导员等职，从上到下逐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

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和十位大将中，八位元帅和六位大将均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这是世界军事史和战争史上的奇迹。周恩来强调“我们共产党人要有继续奋战在党的旗帜下的决心”；南昌起义前，总指挥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却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面对党的指示，朱德、叶挺、刘伯承等军事领导人临危受命，毫不犹豫表达对起义的支持；陈毅等大批没赶上参加起义战斗的革命志士，披星戴月追赶队伍，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他们用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开启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艰难征程。

方寸之间显“军魂”

张 苗 王居首

邮票是时代发展的见证，方寸之间记录着社会发展的变迁，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等等，这其中当然也有很多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瞬间。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根本的“红色基因”之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邮票也以其上栩栩如生的故事图案，再现了上述我军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像一位解说员般诉说着人民军队“军魂”的历史进程，告诫我们要时刻保持政治上的坚定，以军魂意识确保“红色基因”永不褪色。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古田会议

最下面这张邮票上的图案为古田会议会址，即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扩大后，随着形势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党组织和红军吸收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由于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如流寇思想等逐渐在红四军内蔓延。受历史条件所限，毛泽东试图纠正上述错误思想倾向的想法未能实现。上述情况引起了党中央高度重视，形成了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召

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00多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克服红四军内部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大会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建军建党的经验，确立了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基本原则，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然是人民解放军行动的基本遵循和原则。

支部建在连上：

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是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整编，中间这张邮票上的图案即为当时改编的地点——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西秋收起义爆发。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起义部队因多次战斗失利，在9月29日到达三湾村时，人员已不足1000人，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

为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适应革命斗争需要，毛泽东在当晚就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主要内容为：第一，遣散部分不愿留队的人员，部队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做到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第三，规定官兵待遇平等，干部不得殴打士兵，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这三点，就是三湾改编的核心内容：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

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探索和实践，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是毛泽东把“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之设想付诸于实践，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军事上的开篇之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湾改编给军队注入了“听党指挥”的灵魂。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和实行党代表制度，使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就在部队第一次建立起严整的党组织，为解决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党全面建设和掌握部队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开创了党指挥枪的历史性探索，从此，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国历史学家在总结击落山本五十六时，把成功原因之一归结于山本的守时——整个战斗不过3分钟，如果日方调整行程，将是另外一种结果。从日方史料来看，山本一行动身前，有多位部下建言取消或调整行程，但他却一意孤行、按时出行，正中对手下怀。与其说这是山本五十六的固执倔强，不如说是日本民族固有的保守性和非理性使然，泛化至二战中，无论是日本海军还是日本陆军，一旦制定作战计划，就要不折不扣去执行，完全不顾形势变化和战情擅变。这种战场执行力堪称一流，战术灵活性却惨不忍睹的弊病，几乎贯穿了战争全过程。日本海军飞行员渊田美津雄大佐在回忆录中写道：“战败的根源深深蕴藏在日本人违背理性和容易冲动的国民性格中。由于缺乏理性，往往把愿望和现实混为一谈，行事缺乏慎重。只有草率的行为失败了，才会理智地去考虑它。即使考虑了，又往往为失败寻找借口。”

(作者单位为黑龙江省尚志市人民武装部)



原典

打草惊蛇，计名出自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与宋代郑文宝《南唐近事》中的一个故事：说的是唐朝有一个名叫王鲁的贪官，在批阅案卷时，发现有人联名控告他属下的一名官员违法乱纪，王鲁十分惊恐，情不自禁地在状子上批了八个字：“汝虽打草，吾已惊蛇。”

“打草惊蛇”原意是通过打草，使藏在草里的蛇受到惊恐而逃窜。此计引申为在敌方兵力没有暴露、行踪诡秘可疑、意向不明时，切不可轻敌冒进，要依据侦察来加以确定，完全掌握情况之后再付诸行动。本计的要点是“叩实”，即打探对方的真实想法和意图，再决定自己的行动。

古代战例

公元218年，刘备领兵10万围攻汉中，曹操领兵40万与蜀军隔汉水对峙。诸葛亮命赵云领兵五百，伏兵于汉水上游一带土山，每逢曹营灯火熄灭或军士们刚刚歇息，便擂鼓吹角呐喊一通，但并不出战。曹兵听到喊声震天，疑有蜀兵劫寨，赶忙披挂出营迎敌。可出营一看并无动静，只好回营安歇。待曹兵刚刚歇定，号炮又响，鼓角又鸣，呐喊又起。这样一夜数次，弄得曹兵彻夜不得安宁。一连数夜，曹军人心惶惶，曹操担心一旦某日蜀军真来劫营措手不及，只得传令退兵30里，找空阔之处安营扎寨，诸葛亮乘势挥军渡过汉水。

现代战例

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英、法联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为埃及塞得港。11月5日，英、法联军按照预定作战计划对塞得港发起进攻。为了摸清埃及的军事防御体系，英、法联军采用了“打草惊蛇”的战术。

拂晓，英、法联军的机群从海上方向进入塞得港埃方观察哨视野，埃及军民立即进入阵地准备迎敌。随后，天空

出现伞兵，埃及军民纷纷朝伞兵猛烈射击，从火力点冒出的硝烟将阵地位置暴露无遗。然而，那些伞兵是用木头和橡胶做的假人，目的就是引诱埃及人暴露火力部署。随后，英、法联军出动轰炸机和战斗机准确地投弹扫射，塞得港工事很快被摧毁，埃军伤亡惨重。英、法联军削弱了埃及的地面防御作战能力，为后续的空降和登陆创造了有利条件。

计谋分析

上述两个战例虽然都应用了“打草惊蛇”之计，但又采用了不同的用法。诸葛亮巧计退曹兵属于“打草惊蛇”，即用棍子打草，引起草中之蛇的恐慌，使之逃离。这种“惊”法的精髓是借宣示性的行动，让对方知难而退即可，“打草”者未必真的就想与“蛇”交手。英、法联军空降假伞兵属于“打草惊蛇”，即投石问路、引蛇出洞。这种“惊”法的精髓是使“蛇”离开它的地盘，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然后选择较为有利的地形捕捉或歼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事实上，“打草惊蛇”还有第三种形式，即“打草惊蛇”，这是一种间接的警告之法，即通过打击蛇的七寸，使蛇感到恐惧。这种“惊”法的精髓是抓住蛇的七寸，在战争中就是要掌握能够决定敌人生死存亡的“命门”，令其左右为难，不战而屈人之兵。平津战役期间，我军包围傅作义集团西逃绥远老巢的必经之地张家口，就是抓住了该集团的“七寸”，为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打草惊蛇”的谋略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虽各具特色，但都带有“惊”的底色。运用此计的关键在于能够通过“疑以叩实，察而后动”准确了解情况，从而达到了解敌人、调动敌人，又不让自己的行踪为敌人掌握的效果。

一是要做到善疑和察。即对情

况不明，存在很大疑问，特别是异于常势、常规、常理、常情者，需要深入地侦察、核实，这也是此计暗语所说的：“敌人不露，阴谋深沉，未可轻信，应遍探其情。”没有疑和察，就难以达到“叩实”的目的，如果没有“叩实”而“动”，那就是盲目，而盲目必然会吃败仗。

二是要采取试探的手法，“以攻为守”。即通过采取试探性行动，主动地促使和引诱敌人暴露，从而达到准确掌握敌情的目的。这也是《孙子兵法》所说的“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作之”，意思是刺激使之发作；“形之”，意思是引诱使之上当；“角之”，意思是试探性角逐。诸葛亮指挥蜀军连夜叫阵却不出战，既能在战略上掌握主动权，又在一定程度上摸清了曹军虚实，可进可退，可攻可守，曹操只能无奈退兵。

三是要有意识“打草”，确保“蛇”的具体位置或攻击意图。因此，“打草”必须有有的放矢，要确保“蛇”受到惊吓，露出尾巴，否则，就可能出现“打草”没有“蛇”甚至被“蛇”反咬一口的惨剧。英、法联军明确埃军火力配置、平津战役期间我军对张家口、新保安围而不打，取得平津战役胜利，就是通过有意识的“打草”达到“惊蛇”的效果。

山本五十六败亡：宿命还是必然？

张宝权

75年前，1943年4月18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乘飞机赴前线视察途中，遭遇美军战机袭击机毁人亡，这位曾经一手策划偷袭珍珠港、被日本海军尊称为“军神”的高级将领，最终竟死于敌人的偷袭之下，多多少少为这一事件蒙上了一层宿命论的色彩。

然而，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战争胜负既取决于双方指挥艺术的较量，也取决于双方军事决策失误的累加，谁违背规律、犯错越多，谁滑向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山本五十六之所以走向败亡，有本人意志的偶然因素，但更多的是当年日本人违背规律的必然性失误，有的战前就已埋下，开战后更是不断放大，使得这位日本“军神”陷入死地。

重硬件轻软件的短视性失误。“三军之事，莫重于密。”山本五十六遭遇偷袭，直接原因是行动计划被美军截获并破译，根本原因是日本保密意识薄弱、传密措施简单。像高级将领巡视前线行动计划这种高级机密，竟然通过无线电公开传递，所用加密措施也是级别较低的密码，而且每到一站都重复通报一

次。这种麻痹大意，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其原因肇始于日军对美军的低估、对技术保密的轻视。尽管日方在偷袭珍珠港时一度注重严格保密，但随着开战后一系列胜利，日本人很快被冲昏了头脑，关注重点全部放在美日军舰建设被极度忽视。尽管日本海军的密码本在战场上多次丢失，但日方一再对此掉以轻心。日本人实松让在《情报战》一书中回忆，日军认为，“泄露一点机密也没啥，若是美国人出来的话，正好就可以像老鹰捉小鸡一样轻易干掉它”。负责陆军通信业务的户村盛雄少校战后回忆称：“当时都以为，机械式密码是不会被破译的。”然而，美军仅用几个小时就破译了山本巡视前线的电文，美军还严格执行战场保密条例，新首脑海上飞行中一律不使用无线电，飞行员只凭目视、罗盘和速度表接敌；斩首成功后，美军不仅严密封锁消息，还接连出动飞机在附近巡航，制造意外巧合的假象。美军保密的煞费苦心与日军失密的漫不经心形成了鲜明反差。

重策略轻战略的功利性失误。在很多人心中，山本五十六被美化成低估值、对技术保密的轻视。尽管日方在偷袭珍珠港时一度注重严格保密，但随着开战后一系列胜利，日本人很快被冲昏了头脑，关注重点全部放在美日军舰建设被极度忽视。尽管日本海军的密码本在战场上多次丢失，但日方一再对此掉以轻心。日本人实松让在《情报战》一书中回忆，日军认为，“泄露一点机密也没啥，若是美国人出来的话，正好就可以像老鹰捉小鸡一样轻易干掉它”。负责陆军通信业务的户村盛雄少校战后回忆称：“当时都以为，机械式密码是不会被破译的。”然而，美军仅用几个小时就破译了山本巡视前线的电文，美军还严格执行战场保密条例，新首脑海上飞行中一律不使用无线电，飞行员只凭目视、罗盘和速度表接敌；斩首成功后，美军不仅严密封锁消息，还接连出动飞机在附近巡航，制造意外巧合的假象。美军保密的煞费苦心与日军失密的漫不经心形成了鲜明反差。

重计划轻变化的偏执性失误。美